

对话

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黄德宽：

传统文化教育需打“合力拳”

■本报实习生 赵鹏飞 记者 陈彬



日前,中厅、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份文件让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黄德宽感到十分欣慰。作为古文字学、出土文献和先秦文化方面的专家,在做了大量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方面研究的同时,传统文化教育成为他持续关注的话题。

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黄德宽。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黄德宽有着明确的分析和认识。

在他看来,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有一个非常好的大背景,但绝非一日之功。如何让传统文化教育相关建设意见更好落地,让传统文化的营养滋养更多人,是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应合力而为的“分内事”。在国家大力支持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如何让这项工作观念和操作层面上都有所提升,需要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传统文化教育需更好“落地”

《中国科学报》:您为何持续关注传统文化教育?

黄德宽:传统文化是我多年持续关注的话题。作为学者,我做的就是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2016 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的提案就关注了青少年中传统文化教育与价值观的问题。

我今年的提案和去年的有所不同。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在“两办”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里有非常全面的安排。我今年关注的重点是传统文化教育该怎么做,才能使“两办”的意见很好地落地。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中央各部委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同时,教育部的相关意见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有安排。但通过综合调研,我看到了它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

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主要是人的塑造。传承需要人,我们的对象也是人,并且主要是青少年,所以我们要着力把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做好。但现在的工作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我最大的感觉是, 传统文化的弘扬不仅靠学校,

记者快评

高考英语,一撤了之?

■陈彬

每年两会,有关高考的话题总会成为热点话题。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宇华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光宇关于取消高考英语科目的建议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有媒体引用一份网络投票,赞成取消高考英语考试的网友比例已经高达 82%。

八成网民赞成取消高考英语考试,这一数字看起来吓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相当比例的网友赞成取消英语考试,并不是源自于理性的思考,更多来自于一种情绪的发泄。

相信只要是上过中学乃至大学的人,不被英语“折磨”的定是极少数。李光宇也表示,目前中小学生学习如果按照每天 8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计算,在一个孩子最美好的 10 年时光里,竟然有近五分之一(18.13%)的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

而英语如此受重视的根本原因,无外乎这是一门高考必考科目。从这个角度上说,取消英语高考似乎的确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英语学习占用时间时间过多的问题。

但是,如果高考真的取消了英语,在应该教育的大环境下,还有多少学生依然会学习英语?作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如果我们的学生不再掌握英语,未来我们又将如何与世界进行顺畅的交往呢?

不可否认,目前无论从英语教学方式还是英语考试制度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但简单的撤销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遗憾的是,这种“既然不行,干脆撤销”的观念,在国内教育领域并不鲜见。比如几年前,当自主招生制度屡屡爆出问题时,“取消自主招生,回归统一招生”的呼声也曾一度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取消自主招生,还是取消高校英语科目,根本上更像是一种回避问题的偷懶行为。一些制度的确可以取消,但取消与否的依据并不在于现阶段该制度是否存在问题,而在于该制度是否符合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是否符合学生培养的规律。从这个角度上看,高考英语的设置,其实是符合教育开放化趋势的。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或者降低英语考试难度,乃至探讨多次考试等形式,但却不能因此忽略了英语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种导向,如果导向没错,便万万不能改变。

社会、家庭、环境都要发挥合力,要综合去做。

《中国科学报》:您怎么看当今的传统文化?

黄德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主要是传承得好。近代以后,现代社会形态和传统文化形态之间的不同,让传统文化受到影响几乎是必然的。

当今,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特别是中国作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提供中国制造,还需要向世界提供自己的文化样本。

在当前背景下,从中华文化中吸取无尽的资源来涵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时为世界提供中华文明的智慧,是全世界都需要的,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从这个高度来看,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教育迎来了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机。

高校需理顺传统文化教育思路

《中国科学报》: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度和掌握度在近两年或有提高,但整体上相对较差,您觉得高校该怎么做?

黄德宽:从实际开展情况看,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大学亦然。教育部要求各类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都要加强,但中小学后的中考、高考,似乎让这项教育退到了无足轻重的位置。

总体来看,综合性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比理工科院校要好。许多高校将传统文化教育列入学校的人文素质课。但大多数是很不系统、很不全面,也很不深入的。

域外传真

学生应该同时在这几所大学里学习吗

■乔恩·史葛

高校学生应该能在不同高校之间无障碍学习,通过获取不同学校的学分来构成自己个性化的学位课程。

政府希望新学生办公室能负责监控、报告并积极安排学分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积累和互认。对学生来说,他们可以灵活学习,自主决定自己学什么、在哪学、怎么学。

然而,对于这种模式,数十年的努力也只带来了有限的成功。目前,学生可以在高校之间自由学习,尽管这几乎只发生在每学年的结束。在完全学分转移体制下,学生可以带着他们已经修完的学分,在任何时期选择在一个新的大学重新开始学习,然后继续下去,并完成所有的学分转移。理论上,他们也可以同时在多个大学学习。

事实上,这种教学模式存在诸多挑战,其中一些甚至事关高等教育的原则。

按照我们的想法,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应在更高层面,不断引导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自我选择、评价的能力。

对多数学生来说,停留在人文素质课这一层面是不够的。到大学阶段仅靠课程解决传统文化教育已经晚了,最重要的还是在中小学阶段打好基础。经过 12 年的教育,学生本就应该具备较强的阅读能力。到大学阶段再进行一些传统文化研修、研读,得到大学教育环境的进一步陶冶,学生就能自我解决传统文化学习的相关问题。

所以,问题表现在大学,但重点还是要抓中小学。另外,大学要重视面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读物,这需要学者身体力行地去做。一是要有更多学者来写普及读物,二是要多向大学生开展传统文化讲座。我在开展传统文化讲座时,就了解了学生的很多问题和思考。我们不能说学生不热爱传统文化,关键是他们需要好的读物、讲坛来深入接触。如果我们中小学阶段把基础打得很好,大学再去提高深化,传统文化就很自然的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了。

《中国科学报》:高校除了做好自身工作,还需要如何借助外力?

黄德宽: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很重要。高校需要通过社会环境,借助一些平台和外力来开展工作。我今年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提议丰富和充实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我们应发挥制度优势,调拨国家优秀的文字文物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组建专家团队,让博物馆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

我希望有关部门研究建立语言博物馆的可行性。中国有数量众多的民族语言,这是一笔丰

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然而,绝大多数民族语言进入濒危状态。其中,方言作为重要的文化化石,如果被抛弃就特别可惜。这些整合的工作都是语言博物馆应该做的,也是高校应该借助的外力。

需做大优质高等教育“盘子”

《中国科学报》:有人说:“传统文化教育重点应是中小学,但现在存在大学在给中小学补课的情况。”对此,您怎么看?

黄德宽:到大学阶段,我们会发现学生存在着人格、素质、知识甚至健康等方面的缺陷。这与不少家庭一切为了分数、考试、升学的教育氛围有很大关系。传统文化的教育要从小抓起,甚至靠家庭熏陶慢慢地养成,而中小学阶段一些本该被重视的基本素养、素质教育,许多家长和学校反倒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传统文化对涵养人的性格、情操、修养是非常必要的。忽略它,丰富的童年、少年生活就变得单调乏味,以致知识获取非常有局限,也出现基本素养和知识素养不完善的问题。如果到大学还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那也有可能再无机会深入接触和系统学习传统文化了。

我觉得要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把优质高等教育的盘子做大,给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增加空间。高等教育是教育龙头,中西部、地方院校高水平学校越多,高考压力就越小,中考压力也就相应下降了,这样也就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中国科学报》:高校的传统文化缺失,根源在于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欠佳,再深究就是优质高等教育的盘子太小,这好像是一个连环?

黄德宽:是的。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传统文化教育涉及顶层设计、战略安排,虽然这只是教育的一个切口。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从小抓起,但仅就传统文化教育谈传统文化教育,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实现这个目标是要打折扣的。

小学生低年级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到了五年级,因为中、高考的压力,学生的关注点明显转移。我们应该办好高等教育,重视地方院校,分层分类地办一些好大学、好专业,让学生有更多更公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作为决策者,在决策上应通盘考虑,作为学者的我们要身体力行。同时,社会力量、媒体力量要致力于共同创造一个为传统文化的普及做贡献的氛围。现在各方面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观念在提升,但关键是政策要跟进。

我曾多次提出,教育部面对的是全国的高等教育。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重视总数占 96%的地方院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也要注意,一流不是凭空出来的,它背后有深刻的逻辑。只有我国所有的高校教育质量和水平上去了,才会产生世界一流大学。在顶尖大学后面要有一批优秀的学校,只有这样才可实现教育的分层分类,合力提高教育质量。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教育才能拥有更好的施展空间和实现条件。

通过专业和法定监管机构来保证学位项目的资格认证?越来越多的项目被有着整体结果和标准要求的大学所认可。然而在这些要求中,大学可以灵活的设计最适合自己专长和教学方法的方案。

我们发现,在学生的认知中,这种学习模式最大的挑战在社交方面。对于传统学生来说,转到另一所大学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社交突变:刚刚建立的朋友圈就此消失,他们又要开始着手建立新的社交圈,多数学生并不希望总是这样从头再来。

如果学生对于学分转移的愿望很强烈,那么最好的解决方式是遵循学生的愿望,让他们可以在大学之间无障碍学习。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通常指只发生在第一学期末,并且第一学期的成绩不计入学位项目的总成绩。

(作者系莱斯特大学副校长,阎风云编译)

高教视点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大学应将去行政化作为一个抓手,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

这已经不是龚克第一次谈加快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了。2014 年两会期间,他称学校的行政级别扭曲了学校内部人员的关系,高校去行政化必须要尽快落实。2015 年他对记者提到大学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意思的是,龚克所提到的取消行政级别,并非他的改革建议,这早在 2010 年就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为何纲要写明要取消行政级别,高校校长也赞成取消级别,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却很缓慢呢?究竟是什么阻碍这一改革的推进?

来自教育管理部门的普遍意见认为,取消级别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取消级别那么简单,这涉及政府管理学校模式的调整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既有政府行政部门放权的阻力,也有学校既得利益的阻力。目前,政府部门和高校设计的改革路线图,是从取消学校二级学院行政级别开始推进去行政化。多个地方政府部门已选取部分高校进行这一改革试点。

相对于没有任何改革行动而言,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的改革试点,有着积极意义。然而,这一改革试点的前景并不被看好,因为在学校有行政级别、政府管理学校的基本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无法撼动行政治校,到头来,二级学院负责人还是会套用级别进行任命、管理。

选择高校二级学院进行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试点用意很明显,即面临的阻力可能更小。但是,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终究需要啃硬骨头,因此,改革应该抓牛鼻子。多年前,笔者建议,可以选择从取消北大、清华等校的行政级别开始,启动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假如这一改革在北大、清华取得成功,改革的示范效应将很强,取消其他高校的级别也就变得轻而易举。

国家在推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落实时,是选择了高校进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试点的,却没有选择高校进行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试点。也许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当前,则有一个进行这方面改革的好时机——“双一流”建设。我国可以把“双一流”建设与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改革结合起来,把接受取消行政级别、启动学校全面去行政化改革,作为获得“双一流”建设支持的基本条件。换句话说,所有“双一流”建设学校,在申请“双一流”时,要拿出具体的去行政化方案,启动“双一流”建设时,都将启动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

这不是强高校之所难,而是建设“双一流”的必然选择。因为如果要建设“双一流”,就必须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办学体制改革,假如在办学中还实行政治校,那“双一流”建设就仍旧可能存在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和搞形象工程的问题。高校一方面会缺乏自主权,继续围着行政指标办学;一方面会用行政管理学校内部的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令教育与学术急功近利。

在国家出台的“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明确要求要以改革为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要克服“985 工程”“211 工程”建设存在的弊端,不能再走“985 工程”“211 工程”建设的老路。因此,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将是“双一流”建设必须进行的改革。我国当年推进“985 工程”“211 工程”建设的最大问题是,采用行政手段推进,并强化学校的行政级别——入围“985 工程”的高校后来将级别提升到副部级(只有在后期被舆论质疑后才有几所高校仍维持正厅级),这是在制造学校的等级、身份,加剧高校行政化。

“双一流”建设是推进大学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契机。从整体改革看,这是建设“双一流”的必然要求,而从改革的推进看,这是一个极好的抓手,地方政府和高校均有建设“双一流”的积极性,对获得资助者提出改革任务与要求,也符合资助逻辑。

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席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双一流’不是再走一遍‘985’‘211’的老路,所以拿着‘985’‘211’的船票上不了‘双一流’的船。”他说,“‘双一流’建设的遴选工作基本上是第三方在做,不是到学校做评估、搞包装。我们要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进行竞争优选、专家评选、政府比选、动态筛选。”这是尝试在进行政府管理教育模式的改革,如果能将“双一流”建设与推进大学去行政化结合起来,将会让改革效应更为突出。(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不妨把『双一流』建设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结合起来

■熊丙奇

多维度协同探索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李凡长

当前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却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实践能力不强、创新能力缺乏、难以适应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需求等问题。

IT 人才的培养必须注重“学”与“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 IT 人才的教育要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在坚持创新思维的同时要加强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学院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网络工程专业,开展了“个性化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教学资源生成机制、搭建跨界融合实践平台、重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拓展国际交流路径”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研究,构建了“人才培养、教学资源、实践

平台、教师发展与国际交流相互支撑、合力共促的‘多维度协同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在科研反哺教学方面,我们采取“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本科生做一堂 50 分钟的学术讲座,一个 100 万以上的横向项目和企业联合搭建一个本科生科研实践平台”等举措。近五年来,本学院教师已为本科生作了 100 余场学术讲座,搭建了 15 个面向本科生的校企合作科研平台,让学生无论从学术前沿领域还是实践操作方面都能得到提高。

在多年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多维度协同教育理论框架,其中包括多维度协同教育原理、多维度协同教育空间理论、多维度协同教育的评价和多维度协同教学方法等内容,并将

多维度协同教育理论应用于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相关成果已总结成《多维度协同教育理论与方法》并以专著形式在 2016 年 12 月正式出版发行。自 2011 年以来,苏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有 30%的本科毕业生赴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大学深造;学院先后建成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国家示范性工程专业联合培养基地、国家特色专业、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和省级品牌专业等平台。

教育强则青年强,青年强则国家强。让全社会一起来推动“多维度协同教育理论”的探索与实践,共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作者系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